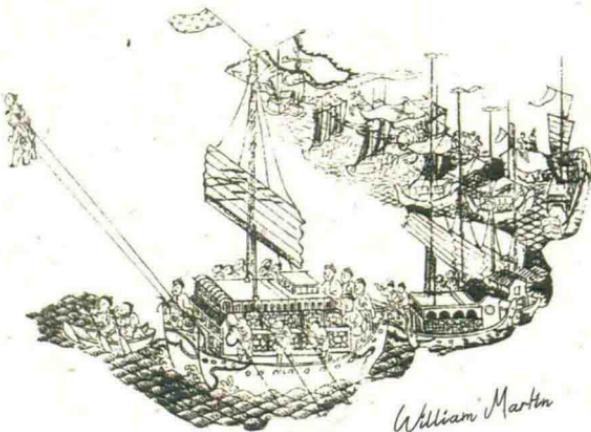


花甲紀記 (修订译本)  
*A Cycle of Cathay*

[美]丁韪良 著  
沈弘 恽文捷 郝田虎 译



# 花甲帆记（修订译本）

## A Cycle of Cathay

[美]丁韪良 著

沈弘 恽文捷 郝田虎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甲忆记：修订译本 / (美) 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6

(欧美汉学丛书·史地风俗系列)

ISBN 978-7-5486-1507-1

I . ①花… II . ①丁… ②沈… ③恽… ④郝… III .

①丁韪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1827—1916)—回忆录 IV . ①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3994号

本书据纽约 Fleming H. Revell 出版公司 189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许钧伟 李声凤

封面设计 魏 来

## 花甲忆记(修订译本)

著 者 [美] 丁韪良

译 者 沈 弘 恽文捷 郝田虎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5万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07-1/G · 572

定 价 68.00元

## 作者简介

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58年任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参与起草《天津条约》，1863年由宁波调往北京。1869年经赫德推荐，就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被聘为西学总教习。1916年在北京去世。著有《花甲忆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多种著作，并曾将惠顿的《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

## 译者简介

沈弘，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现为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及“沈弘工作室”负责人；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外国语言与文学组成员、哈佛燕京学社2018—2019学年访问学者。

恽文捷，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执行主编，主攻国际关系史、中外交流史、中南亚区域研究和世界经济特区研究。

郝田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现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等。

## 序

2008年8月8日晚8点，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鸟巢”正式拉开帷幕，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一个缤纷灿烂，自信满满的中国。是啊，改革开放以来连续近三十年的发展和腾飞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令中国人扬眉吐气；而经过了七年的积极准备之后，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2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北京，中国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变为事实；而开赛后的中国代表队更是捷报频传，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成了如今的金牌大国——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成就和中华民族崛起的自豪感怎么能不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的亿万中国人血脉贲张，激情满怀呢？

假如将时间拨回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乱不已，国家腐败，民族危亡，鸦片泛滥，灾荒不断，经济崩溃，老百姓们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到了快要沦为亡国奴的边缘。在那个时候，又有谁能看好中国，并预言中国会有光辉的前途呢？

有！一个隐居在北京西山宝珠洞的八旬老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就曾一直持乐观的看法，并且还多次撰文，预言中国定会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这位睿智的老人就是本书的作者，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来又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早在1868年10月，丁韪良就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做过一个著

名的演讲，题目就叫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给他朝夕相处已近二十年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这个长篇演讲的稿子发表在 1869 年 1 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 的 47—68 页上。上面所引述的这段话表明，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远比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们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都更为深厚。三十二年以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将经过改写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 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 这部书的首篇。然而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他却似乎一字未改，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丁韪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虽然在不断地加深，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的了解和同情心却始终不渝，贯穿了他整个人生。

丁韪良原先演讲稿中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几乎一字未改地保留在了三十二年后那篇新的文章之中，在这第二段话中，他把中国所

面临的危机比作黎明前的黑暗，而将中华民族誉为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时会冲破那死亡般的黑暗，照亮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上了一定年龄段的人听了这段话会感到格外耳熟，因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就曾采用过同样的意象和比喻，即在革命前途最黯淡的时刻把未来必将诞生的新中国称作“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一个经常被指是“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之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看不出有任何的联系。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还都记得，当湖南的热血青年毛润之于1918年到北京来寻找革命真理，并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的时候，作为该图书馆创始人之一的丁韪良在北京刚去世还不到两年。丁韪良的主要论著和文章在北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谁又敢断言毛润之没读过丁韪良的文章呢。说到底，这两个人对于中国的未来都是非常看好的，而且他俩有关中国命运的预言如今均已得到了兑现。

丁韪良著述甚丰，根据并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现在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它们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系列的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

(*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是对他来华前46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各类人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外部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年至1907年间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以及表达了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

有趣的是，丁韪良将上述1901年改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用作了这第三本书的书名，这证明前面那两篇文章和这本书的主旨都是相通的。《中国觉醒》这个题目实际上跟传说中拿破仑有关中国的一句名言有关：据传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一头睡狮，并且预言：一旦这头狮子惊醒过来，整个世界的格局将会为之改变。丁韪良显然认同这种说法，早在《汉学菁华》的首篇中，他就已经采用了“睡狮惊寤”这么一个意象来描写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把夭折的戊戌变法视作是中国擦拭眼睛，试图惊醒过来的一个标志：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东方巨人都一直在擦拭着眼睛。每一次跟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后果都会使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助状态和更加想在新的一天到来之际睁开眼帘。

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那几年里，这位巨人从来也没有这么清醒过，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试图将他的统治变成一个改革的

时代。慈禧太后发起的反动政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震惊，证明了改革运动的力量和现实。所以说这个运动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动乱的效果将会是唤起新的行动。可以预见，中国人民将会以从未有过的急切心情去欢迎新的思想。（《汉学菁华》，第1页）

1902—1907年间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更加使丁韪良确信，一个重大和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正在中国发生：在军事方面，他见证了清政府企图打造一支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陆军和海军的努力；在教育方面，他也目睹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方法被皇帝下谕令废除，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现在经过考试，也能够得到进士和举人的头衔，而这一政策正在激励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到西学的源头去寻求知识；在妇女解放的领域，他也看到女子学校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女子不再被排除在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且缠脚等陋习也已正在被摒弃；在宪政改革方面，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已经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而且得到了端方、袁世凯等高官要人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将会有个光辉的未来。

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好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同情心。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在这个“译后记”中对于我们这位北大的“老校长”进行全面的辩护。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辩护就是把丁韪良的主要作品忠实地翻译出来，让广大的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让读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某一位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阅读中通过这位世纪老人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来反观中国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和人物，或领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错综复杂性。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过去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花费了不少精力来翻译丁韪良的三部主要作品：《花甲忆记》（2004）、《汉学菁华》（2007）和《中国觉醒》（2008），并先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学林出版社最近要再版丁韪良的《花甲忆记》，这促使我们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原来的译文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订正了原来译文中的一些错误，又增补了对于书中所引典故的注释。编辑叮嘱我为新版的译本写一个序言，以说明新旧版本之间的一些区别。

首先，《花甲忆记》的旧译本是我们在2002年之前完成的。那是我所翻译外国人写中国的第一本书，由于我自己的专业训练是英语文学研究，所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相对比较缺乏，一些必要的人文地理常识，更是显得生疏。参与这本书翻译的还有我的两位助手，郝田虎和恽文捷。当时他们都刚刚拿到硕士学位，之前也没有翻译过正式出版的书籍。虽然我们大家对于翻译这本书都比较用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诗歌、对联、诏书和奏折等，也都绞尽脑汁地试图回译成中文。但毕竟还是火候不够，最后的译文虽然读起来还通顺，但是在内行的眼里，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出一大把错误。

在过去这十几年中，对于我们的译文所提出的最严厉，也是最到位批评的是王文兵的书评，《此〈花甲忆记〉非彼〈花甲忆记〉：丁韪良 *A Cycle of Cathay* 中译本勘误补正》（《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王文兵是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的讲师。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丁韪良的，所以对于后者的这部代表作相当熟悉。

他的上述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我们把丁韪良

的 *A Cycle of Cathay* 这本书署名译为《花甲忆记》并不合适，因为这是丁韪良 1910 年另一本中文口述书的名称。第二部分集中指出了我们在这本书中从英文回译成中文时所犯的错误。第三部分是讲误译的问题，即本书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所犯的理解和表达上的失误。

我们在对以前的译文进行修订的时候，十分重视王文兵在其文章中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在回译和误译方面基本上都采纳了他的意见。不过在书名的译法上，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六十年记》或《中国花甲记》是比《花甲忆记》更好的译法。我个人认为，《花甲忆记》这个书名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丁韪良的本意：因为这是一位花甲老人（丁韪良在写这本书时已 69 岁）对于中国自中英首次交战以来一个甲子轮回的历史回忆。虽然 1910 年的那个《花甲忆记》包括了丁韪良对于 1896 年之后中国所发生一些事件的回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丁韪良在 1905 年 12 月写的新版序言里已经对从 1897 年至 1905 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追述，并且预言了中国这个巨人即将觉醒。柯饶富（Ralph Covell）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丁韪良 1910 年《花甲忆记》是 *A Cycle of Cathay* 的中文缩写本，在这一点上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

丁韪良本人是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所以他在书中所提及的许多在华外国人也是传教士。大家都知道，为了传教的方便，一般来华的传教士都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在以前译文中翻译得不到位的传教士中文名字这次全都进行了重译。传教士的中文名字有一个特点，即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我们则力求采纳最原汁原味或最通行的译法。例如王文兵在文章中提及 William Burns 应译为“宝为霖”，但查阅相关的工具书，我们发现这个名字的译法还有“宾惠廉”“宾为霖”“宾威廉”等不同译法。“宝为霖”可能是较早的一种译法，但却不是最广泛被接受的译法。上网搜一下，译

作“宝为霖”的几乎没有，而“宾为霖”则是最流行的译法。所以我们最后采纳的是“宾为霖”这个中文名字。

新的译本在中文回译上做了努力，凡是能够查到中文原文的，我们都不辞辛劳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诸如皇帝上谕、外交国书和照会等文书、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条款等，我们都尽量做到引用中文原文。对于误译的问题，我们更是提高警惕，在可能的范围内力求避免。当然，这类错误要完全避免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对我们的译文提出批评，以求能够使译文不断地完善。

十几年来，我们的译者也在不断地成长，当年刚拿到硕士学位的郝田虎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回到北京大学英语系教了十年的书，现在已经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正教授。恽文捷后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拿了另一个中国边疆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拿到了博士学位，跟导师吴义雄教授一起编译了一本《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2015)，而且还在深圳大学教了十几年的书。我自己也在这段时间里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所以我对于《花甲忆记》新版译文的质量有充分的信心。

丁韪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20世纪前后的中国教育、司法、科普和整个现代化进程均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的《花甲忆记》一书记录了中国19世纪后60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旧版的中文译本已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我相信新版的译文定会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沈 弘

2017年，耶鲁大学神学院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孙辈和全体美国人民，

希望它能使大家关注一个伟大国家的未来，

未来美国与它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紧密和重要。

“人们在谈论自己时，总是显得健忘。”

——普罗斯珀·梅里美

“在写作时要依靠记忆或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依靠幻想。”

——W. 冯·洪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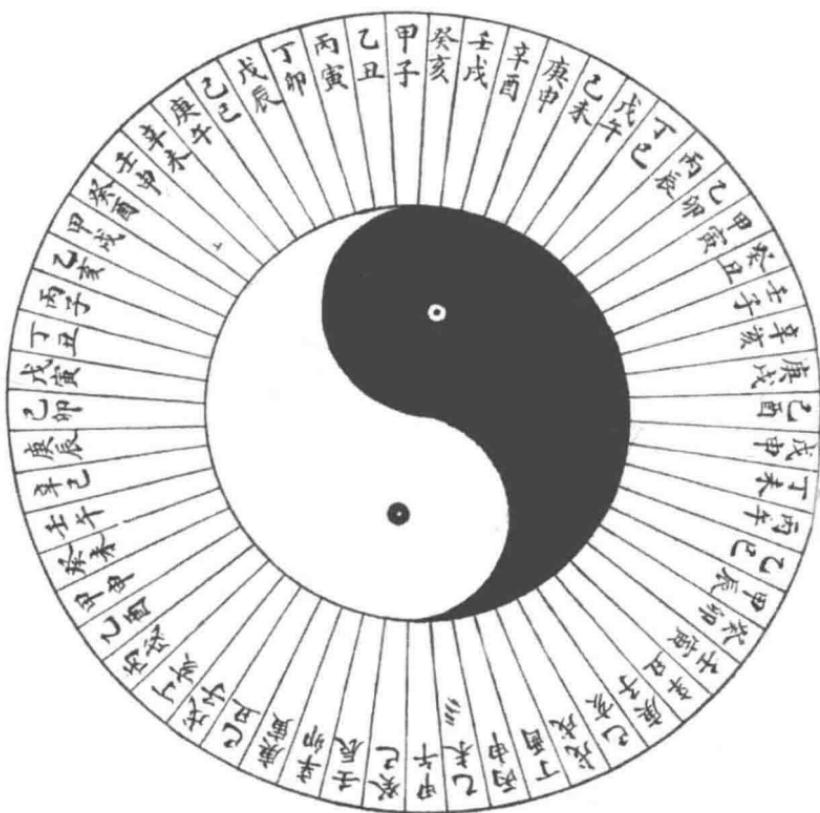


插图 1 中国甲子

中国一甲子的周期为六十年，其中每一年都有单独的名称。它们从上而下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在外层的这个圆形里。本年（1896年）<sup>①</sup>是干支纪年以来第七十六个甲子的第三十二年。圆形内部的两块黑白区域代表着“阴、阳”这一组力，它们构成了中国哲学理论的基点。

<sup>①</sup> 本书初版为 1896 年。——编者注

插图2 在家里的中国妇女



## 作者原序

从中英首次交战之序曲到如今大约为六十年——这恰好是中国一个甲子轮回的长度，尽管我想丁尼生也许更愿意把千禧年看作一个轮回。本书所要讲述的事情主要就发生在这六十年间。在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居住在中国，一半时间生活在南方，另一半时间在北方。除了做传教士外，还当过清政府的雇员。在历史转折关头，我为祖国服务了两年，参加了美中条约的谈判，该谈判带来了北京对外国人的开放。

在总理事务衙门下设同文馆的职务使我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观察京师近三十年间外交活动的发展进程。然而我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意在做一个历史年表，而是要描写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对某些人来说，这种个人因素也许会增加他们的兴趣；对全体读者而言，我很希望这一做法能增加本书的可信度。

假如我从前的中国学生读到此书，我相信，他们也会从中看到对他们国家富有同情心的赞赏以及同样坦诚的批评。对于后者，我确信他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对待。

丁韪良

于纽约奥杜邦公园